

駱編：中國的現代化

張 朋 園

書名：*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*,

編者：Gilbert Rozman

出版：The Free Press, New York, 1982

頁數：XV, 551

定價：US \$22.50

最近三十年來的現代化研究，美國普林士頓大學 (Princeton University) 可以說是一大重鎮。那兒有許多學者聚集，對這一個題目發生相同的興趣。他們的作品受到學界的歡迎，也得到甚高的評價。這兒所要介紹的，就是他們最近出版的「中國的現代化」一書，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。

首先介紹這本書的作者。這一本集體研究的成果，參預的學者有九人之多，網羅了普林士頓研究現代化的專家，還有其他大學的學者。茲略為介紹如下：

Cyril Black: 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。他是現代化的理論家。原先研究俄國史及東歐史，一九六七年發表現代化的動力 (*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*)^① 一書，立即獲得學界好評，成為近十五年來研究現代化的主要參考書，今已成為經典之作。從那時開始，他自己也轉變了研究方向，集中精力從事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比較研究。他對於中國、日本、俄國的現代化最感興趣。由於一個人的力量有限，他邀約同好一同參加。一九七五年發表集體成果：日俄的現代化 (*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*)^②。接着又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研究，成果於一九八二年推出，就是這兒所要介紹的這本大著。

① 郭正昭等譯為中文，現代化的動力 (民國61年臺北環宇出版社印行)。

② 該書參與者除 Black 外，有 Marius Jansen, Herbert Levine, Marion Levy Jr., Henry Rosovsky, Gilbert Rozman, Henry Smith II, Frederick Starr 等。

Marion Levy, Jr. : 教授，功能學派社會學家，同時亦為現代化理論家。他早先對中國的現代化極有興趣，寫過不少文章，其中以「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」(*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*, 1949)一書最為出色。接着又發表兩本有名的大著，一為「社會結構學」(*The Structure of Society*, 1952)，一為「現代化與社會結構」(*Modern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Societies*, 1966)。最近又著「現代化先進與後進的比較」(*Modernization: Latecomers and Survivors*, 1972)，是他對現代化的綜合觀察。

F. W. Mote (牟復禮) : 教授，為美國知名的中國歷史學家，著有「中國學術思想的基礎」(*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China*, 1971)、「中國傳統文明中的城市」(*The C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*)等書，又曾翻譯蕭公權先生的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為英文。

Marius Jansen: 教授，研究日本史及中日關係史，論著甚為豐富，最知名者為「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」(*The Japanese and Sun Yat-sen*, 1954)一書。

Ramon Myers(馬若孟) : 研究中國經濟史，著有「中國農民經濟」(*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*, 1970)、「中國經濟的過去和現在」(*The Chinese Economy: Past and Present*, 1980)等書。現任胡佛研究所(Hoover Institution)東方圖書館主任。

Thomas Bernstein: 研究中共政治，著有「上山下鄉」(*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*, 1977)等書。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。

Sully Borthwick: 研究中國教育史，澳洲國立大學博士，其論文為「晚清的教育與社會」(*Schooling and Society in Late Qing China*)。

Lynn White III: 副教授。研究中共政治，著有「中共控制下的上海人才」(*Careers in Shanghai: The Social Guidance of Personal Energies in a Developing Chinese City, 1949-1966* 1978)等書。

Gilbert Rozman: 教授，社會學家，研究都市發展，尤其對傳統都市有興趣。著有「中國清代及日本德川時代的都市結構」(*Urban Networks in Ch'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*, 1973)、「帝俄時代的都市」(*Urban Networks in Russia, 1750-1800* 1976)、「清代的市集聚落與人口」(*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'ing China*, 1982)。為本書的編輯人。

本書參與的學者既有九人之多，必然要在理論上有一個基本的概念，作為共同的了解，才能有一致的討論方向。首先是現代化的定義問題。現代化討論至今數十

年之久，並沒有一個置諸四海皆準的定義。本書採用的是 Black 和 Levy 二人的觀點。Black 在「現代化的動力」一書中說：科學的革命，人的知識不斷增加，得以漸漸控制其環境，這一種控制自然的進程，就是現代化^③。Levy 在他的「現代化與社會結構」一書中說：現代化就是不再以人畜的氣力為動力，人們所使用的工具亦有不斷的更新和改進^④。本書綜合了他們兩人的創見，現代化「就是科學與技術影響下的社會變遷進程」。他們指的是十八世紀以來有着許多共同性的世界變遷，最明顯的是科學與技術影響下的經濟發展，它使人類的生活改善，從貧窮走向富有，從簡陋走向舒適。

為什麼要以中國的現代化為研究對象？如前所述，Black 氏於研究日俄的現代化之後，有心繼續研究他所好奇的中國現代化問題。參加這一個計劃的人似乎都有同樣的想法。他們發出一個相同的問題：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的大國，為什麼當西方的現代化快速進展的時候，中國卻停滯不進？他們要揭開這一個謎底。一人之力不足以解答這一個繁鉅的難題，九人合力應該可以破除艱鉅。該一計劃始於一九七四年，完成於一九八〇年，為時六年之久。

本書五百餘頁，分上下兩部份，上半部謂為傳統時代，下半部謂為轉變時代，以一九〇〇年為分水嶺。其所以如此劃分，蓋以一九〇〇年以前缺少明顯的變遷，本世紀以來趨向現代化的發展。全書分國際關係、政治結構、經濟結構、社會整合、知識與教育等章節，上半部與下半部之章節完全一致。上半部討論傳統時期政治經濟及社會等之基本問題，下半部討論清末以來變遷的趨向。工作分配，Jansen 擔任國際關係，Mote 與 White 擔任政治結構，Myers 擔任經濟結構與發展，Rozman 擔任社會整合，Borthwick 與 Bernstein 擔任知識與教育，Black 與 Levy 擔任理論性之綜合，Rozman 為總編輯，可謂人才濟濟。

讀盡全書，我們發現一個沒有說明的理論架構。他們用動員 (mobilization) 概念貫穿全書，以觀察中國現代化遲速的癥結所在。動員的原意，在法文為升高羣眾地位 (levée en mass) 之意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德國以總動員 (total mobilization) 政策以對抗同盟國，收到極大的效果，因此，此一觀念今日極受重視。二次大戰之後，國家發展的快慢，動員與否大有關係；動員愈高，發展愈快，反之則無現代化可言。動員觀念在本書中的運用，第一觀察人力的動員，第二觀察資源

③ Black, p. 7.

④ Levy, p. 11.

的動員；中央能否動員地方，城市與鄉村是否連接，……據此基本觀點觀察，甚能深入問題。

本書的又一特色為比較法 (comparative method) 的運用，Black 氏提倡比較方法，在「現代化的動力」一書中極力強調，「日俄的現代化」一書更是隨處表現。本書以中國的現代化比較日本與俄國，何以中國不如日俄，在比較中甚能洞察其癥結。

全書的主要論點：著者指出中國有一個早熟的文化，當西方還在分裂草昧的時候，中國的文化就很發達了。中國的文化有許多是利於現代化生長的。例如高度的中央集權，結構完整的官僚制度，統一完整的民族國家，人民都有強烈的國家觀念，職業趨向專門，思想富於理性，…凡此都是現代化的有利條件。高度中央集權是可以統籌全局。一個英明的君主可以帶給其子民極大的幸福。官僚制度可以輔助君主制度的不是；其層層節制，層層負責，如果君主失去了作為，官僚制度立即接替過來，政務不會停頓，社會不會衰微。致於國家的統一，可以給予人民生活保障，使社會趨向繁榮。西方曾經有數百年的黑暗時代，中國卻有二千餘年大一統的局面，人人愛護國家，每有亂事，無不盡力使之重返統一。中國人十分理性，職業傾向殊分。這些都是現代化有利的條件。

但是中國為什麼不能及時現代化？爲了回答這一個問題，他們從國際關係、政治結構、社會整合、經濟發展等幾方面去觀察，茲分別略加介紹如下：

國際關係：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現代化有沒有妨碍？回答自然是正面的，但限於日本帝國主義而已。中國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失去了走向現代化的機會，尤其是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發動戰爭，中國蒙受最大損失。但西方帝國主義並未造成嚴重的妨害，故中國現代化的受阻，西方列強不負責任。

這是本書論帝國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所得的結論，頗能自圓其說。何以說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妨害，本書的一套說辭顯然受到費正清 (John K. Fairbank) 的影響。費氏說，中國十九世紀對外肆應的不當，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困擾。這個困擾是傳統世界觀的使然。中國人以天朝自居，最近一千餘年來自我中心意識強烈，沒有西方的國際平等觀念，所以將西方人貿易的要求視爲朝貢的關係。這種錯誤當然引起仇視和衝突。中國的累敗於列強，咎由自取。本書循着費氏的觀念，再度討論中國的天下觀。西力東漸，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已經打破。中外接觸，中國雖然受了屈辱，但能够自覺奮起，整頓軍備——自強運動。

不幸爲日本擊敗，自此失去了信心，加上政治衰弱，人口上升，社會不安，現代化更爲困難。這是十九世紀的情形。

繼續分析，一九〇〇年的拳亂，「是反現代化的不智表現。」幸而中國自此脫離了瓜分的危機，列強此後在中國是公平的競爭，門戶開放，不再受到砲艦政策的壓迫。只有日俄才是反對中國門戶開放的。

自辛亥革命到華盛頓會議，日本在中國最有勢力，歐戰期間，奪取德國在華利益，提出二十一條，日本是中國的大敵。華盛頓會議以後，九國公約，列強自我約束，沒有在中國發動新的攘奪。可惜中國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，隨後的國民政府雖然大有可爲，不幸日本旋即發動了侵略戰爭。國民政府爲了抗日，不能不以一切人力物力爭取生存，現代化的希望爲之幻滅。

中共當政之後，可以說沒有外來的壓力，蘇俄十年援助，工業有相當的進展，但文化大革命的突然升起，中國的現代化懸絕達十年之久。最近的「四化運動」，似乎有了覺醒。

這是本書對國際環境的種種解釋。綜合言之，十九世紀對外的關係由於傳統觀念的使然，二十世紀出了不少傑出的外交人才，中國所受外來的壓力較前大大減輕。加上高漲的民族主義，國際環境於中國的現代化並無不利。

政治因素：第三章和第九章的政治結構分析，著者利用「統治權」，「中央政府的權力」，「法律結構」，「利益集團」等幾個變數來觀察傳統時期及二十世紀以後的政治功能，有下述幾種說法。

第一，統治權。大體說來，清人入主中原，漢人默認他們承受了「天命」。所以從合法化觀念看，清廷的統治權向來未受懷疑。加上清朝的皇帝大多英明，開疆拓土，對中國極有貢獻。因此統治權是相當穩固的。不幸就是咸同以後走向衰微，缺乏有力的領導。

第二，中央政府的權力。政府是否有作爲，以下四個條件非常重要：一、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，則易於動員地方；二、有高度分殊的結構，則利於現代化的推展；三、上下溝通，則效率提高；四、政府官員有經驗而具有進取的精神，則政務迅速推動。中國有一個完整的官僚制度，可以說具備了推動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條件。傳統又是中央集權的，皇帝大權在握，任何建設計劃皆可隨時發動。不幸咸同之後的衰弱，軍隊無可用之兵，財政系統紊亂，地方主義興起，大官如李鴻章、劉坤一、張之洞等以慈禧太后爲靠山，破壞了理性的官僚系統。鄉村與中央不能連

接，地方紳士不支持中央，中國呈現「一盤散沙」狀態。

第三、法律結構。中國有一個早熟的文化，但法律系統則屬例外。法律落後的原因，可能與儒家的倫理文化有密切關係。著者指出，中國人多半不願意打官司，除了人命關天，任何衝突都可以用和解的方式獲致解決。地方紳士大老，一言九鼎，不需要上衙門打官司。但是法律系統的缺陷是不利於現代化發展的。

第四，利益集團。中國並無西方式的利益團體（宗教的、商業的等等），但中國的家族可以視為利益集團。中國是一個以家族為中心的民族，家族的利益大於一切，每當王朝政治發生危機的時候，各自為家族利益打算，很少置國家利益於優先的考慮。此種現象亦不利於現代化。

以上是傳統的因素。二十世紀以後，一個最大的變動是廢止科舉制度。科舉制度的廢止使傳統儒家文化的約束解除了，同時改變了領導階層的本質。過去是紳士階級左右社會的動向，一九〇五年以後，紳士階級的影響力漸漸減弱，代之而起的是新式優秀分子，其中以軍人最為得勢。軍人已不像傳統時代之受文人節制，他們以軍隊為個人的勢力，如此一來，政治更形衰退，建設得不到支持。最嚴重的，軍隊消耗了國家五分之四的財力，現代化的希望無法實現。

綜合言之，影響現代化不利的政治因素，一是清朝的衰弱，再則中央與地方的不能連接。加上地方主義，軍閥橫行，諸此皆於中國的現代化不利。

經濟因素：中國傳統的經濟制度是相當健全的，有理性化（契約）的商業行為，自由競爭，貨幣制度。但何以沒有突破性的發展？著者有以下的論點。就經濟制度而言，因為有一個相當合理的制度存在，便沒有人進一步注意改進。政府對民間的經濟活動採取不干預態度，因此很少有促進發展的政策。例如說，政府注意糧食的生產情形，但並不注意土地的改進。民間方面，男耕女織，完全是勞力的，沒有人注意技術的改進。有一些貨品擁有國際性的市場，但經營始終是小規模的。從資本方面看。中國人的收入百分之八〇消耗於食物，沒有餘力儲蓄。富戶人家有儲蓄，但很少作土地以外的投資。人人希望購買田地，因為土地的投資最安全可靠。綜合觀察，中國的經濟力量散在民間，沒有向中央集中的趨勢，因此不能形成強大的經濟力量。最大的困難是人口太多，十八世紀初葉超過四億之後，所有的生產消耗殆盡。經濟不能有突破性的成長。

近代以來，政府缺乏現代化的意願，經濟政策極其軟弱。清季受外來的壓力，賠款累累，百分之十的歲入必須償付賠款或債務，因此沒有建設能力。民國初年軍

閥統治的混亂局面，幾無經濟政策可言。國民政府時期，日本侵略，貨幣貶值，中國的經濟頻於崩潰。中共當政以來，情況好轉，但共產制度不能刺激生產意願，再加上政策性的錯誤，急求發展，適得其反。今日的最大問題仍為人口的壓力，此一困難極難克服。

社會整合：從社會整合的觀念看傳統中國社會，仍然有許多長處，例如中國是個開放的社會，有社會流動。中國的人民識字率很高，男人平均有百分之三〇至四五是認識字的。中國人力爭上游，可以說是一個有成就意願的民族。這些條件都是利於現代化發展的。但為什麼沒有理想的發展，著者的分析如下：

第一，人口的壓力。一七五〇年之前中國的糧食是有餘的，但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年間，人口的增殖率大增（百分之〇·八），糧食漸感不足，沒有多餘的糧食流入市場，不能形成經濟力量，換而言之，人口限制了資源動員。

第二，都市不發達。中國的人口分配，九〇%為農，一〇%為土工商。如果城市的人口為六%，則鄉村中尚有四%的土工商。加上地主也在鄉間，城市沒有經濟力量，不能領導現代化的發展。（著者的另一說法，謂中國的鄉村有七萬至十萬個，市集有三萬五千至四萬個，五十萬以上的都市有十個。但沒有都市化的傾向。因為沒有都市化，鄉村的物資不會流向都市，也不能形成經濟力量。）

第三，家庭中心觀念強烈。中國人以家庭利益為重，政府與家庭之間缺少一個連接體，不能集中發揮較大的力量。

上述三點是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。要有現代化的發展，必須克服這三大困難。因此，當著者論中共的社會政策時，便認定彼等正竭力克服人口的高成長率，用種種方法破除家庭核心的觀念，其生產大隊及幹部制度填補了政府與家庭間的空隙。但是共產黨並不鼓勵城市化的政策，這是否繼續不利於現代化，有待證實。

知識與教育：中國的傳統教育相當發達，識字率也很高，技術比西方進步，人人有成就取向，這些都是現代化的有利條件。但傳統教育也有許多缺點：第一，教育以選才為宗旨，人人志在擠身官僚階層，即使不能求得一官半職，謹守社會禮儀，做為一個安份守己的社會成員，是社會規範的一致期望。

第二，科舉制度以儒家思想為考試內容，人們的思想受到約束，無法走向發展自然科學的途徑。

第三，科舉出身的紳士階級與權力相結合，既得利益不容改變，社會變遷的動力受到了抑制。

二十世紀新式教育代興，知識的方向爲之一變。但由於財政困難，自清末至民國，教育並不發達。中共當權三十餘年，尚未推行強迫教育，目前所實行「五、二、二」或「五、三、二」制度，較之原先的「六、三、三」制度，有偷工減料之嫌，加上師資不足，程度十分低落。

中共因爲中學收學費而大學不收學費，能够有幸接受高等教育者，實爲鳳毛麟爪。文化大革命期間，大學關門四年，高等教育殘破不堪。最近七年來稍有恢復。一九七九年入學人數達到百萬，預計一九八五年以後每年招生三百萬人。但學制有待改善。除非大量派遣留學，師資仍多困難。

以上是本書的基本論點，最後他們作了一個總結，茲節錄如下：

現代化後進國家與先進國家之不同，在於必須加快腳步，迅速發展起來。他們必須仰賴先進國家的技術及資源，以先進國家爲模型，但由於模仿之不容易，往往自慚不如。實際上也必須將所模仿的模型加以修正，使之適合於自己的需要，才能達到迅速發展的目的。

現代化是物質文明的講求，鑑於過去的貧窮與生活低落，不得不如此。然一旦獲得之後，便會立即失悔，因爲自己的優良傳統已經破壞無遺。

傳統中國有許多有利於現代化的條件，例如事功取向，自由的社會流動，有效的官僚體系，識字願望。…但何以轉型不如日本和俄國，解釋起來，不能不歸因於清朝後期的調整能力（coordination）的失去；控制不靈，中央集權也不如往日有效。另一個不平常的現象便是人口大增。太平天國之亂雖然死了不少人，但除了影響農村的殘破，實際人口的壓力並未減輕。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農村的物資很少流向城市，英法日俄等國都有城市化、都有中央集權，而中國卻不如此。

中共當權，中國有了控制與調整。但中共也給中國帶來了一些災禍。毛澤東死後的轉變，可能是一個轉機。

現代前期的變遷：傳統中國有現代化的潛力嗎？宋明已有一些基礎。那時的國際關係良好，以功勳爲取向的官僚制度，使進取的優秀分子有成就感。中國開始了商業化，社會流動以家庭爲基礎，人民可以獲得受教育的機會，這些特色即使日俄也不能相提並論。

但十八世紀的國際關係收縮了，海上發展未能繼續，對外貿易封鎖，內部爲多事之秋，海洋的重要性被忽視了。政治方面，爲了安全的控制，政府有阻塞性的防

範，人們缺少出路，趨向玩世不恭，態度消極，政治衰落下來。滿人未能使行政資源加強，也不能使漢大臣有創造性的作為。政府更忽視了鼓勵紳士階層，他們的家族觀念重於國家觀念。人口增加而賦稅不加，行政組織未見改進，統治階級忽視了新事物的追求。監督阻撓，浪費了現代化的有利條件。經濟方面，十八世紀是有動力的，但行政的衰退，貪污腐化對經濟已構成了不良影響。幸好地方貿易仍然繼續，否則衰退還要加速。最可惜的是政府沒有作為，每況愈下，不能有所振作。十九世紀人口繼續增加，經濟已經難與配合。社會整合方面，清中葉以後也出現衰落，日俄此時都有城市化，社會加速其層次變遷，資源動員強大，已經建立了下層的現代化基礎。而中國的資源不向城市流動，人口沒有節制的迅速增加，資源消耗殆盡。中國沒有俄國的科學追求熱，全民教育也落在日本之後。中國原為最高教育程度的國家，此後漸漸不如日俄。十八世紀開始衰落，十九世紀益發不振。有些意外的問題突然發生了，西洋人的到來就是一例。政府防範人民與紳士，種種控制手段，人們的心理改變了，恐懼大難的降臨，各自設法保護自己，地方主義產生。經濟蕭條，白銀外流，失業人口加多，人口繼續成長，農村的繁榮受到了影響。捐納使教育制度破壞，科舉衰退。

綜合言之，傳統的遺產是豐富的，早熟的文化環境有利於現代化。但十八世紀以後，種種有利條件未能繼續發展，不僅如此，原來的基礎遭到破壞，加上行政的衰落，人口的大量增加，資源消耗殆盡，現代化的潛力減弱。到了十九世紀，情況大壞。

現代化面面觀：中國的現代化到了什麼程度？從一九〇〇年開始，以四分之一世紀（二五年）為一個階段，比較日本與俄國，可以得到一個粗略的印象。

一九〇五年：這一年科舉制度廢止了。此有幾種意義：第一，廢科舉的目的是要在西洋知識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，結果引發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「五四運動」；第二，廢科舉打破了考試與任官的關係，紳士階級的非正式領袖地位無形消除；因為紳土地位的消失，孕育了日後軍閥的出現；第三，以後控制地方的不再是紳士，新出現的領導階層愈發以家族利益為重，愈發沒有國家觀念；第四，原先的社會層次被打破了，然而城市與鄉村的界限更為明顯；第五，傳統教育制度改變了，如何建立新時代的教育制度，卻是一大問題。一言以蔽之，廢科舉等於放棄傳統，其效用有如俄之放奴，日之明治維新。不過中國晚了四十年。

一九〇五年重要性，與俄之一八六一，日之一八六八不一樣。由於德國、美

國之迅速現代化，國際環境已經改變了。帝國主義伸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，國際貿易加大，投資加大。日俄的強盛對中國形成了另一股壓力。越是後進國家，越是困難重重。中國很難建立自主的政策。這比日俄當年所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。但國際環境是否限制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起步，是否使內部的控制與調整更加困難，列強是否奪走了中國的資源，結論是複雜的。二十世紀當然比十八、十九世紀複雜，中國處此局面，有有利的一面，也有不利的一面，但不會對中國構成重大的妨害。中國的問題仍在自身內部。

中國的現代化未能上路，乃由於維新時期的方向不定。滿清政府與紳士階級都有手忙腳亂的現象。比較日俄，俄於放奴之後，地主貴族得到補賞之後，政府立即控制了全局；日本的大名也獲得了補賞，天皇政府掌握了全國形勢。滿清政府倒下之後，沒有一個有力的繼承者，各省都有軍閥起來，地方政府不能接替紳士的功能，鄉村中出現了豪強。以中央集權的觀念來看，中國較日俄又落後了四十年。

經濟方面，一九〇五年左右的中國不會比四十年前的日俄強。日俄在現代化初期的資源較為集中是其有利之處，但中國的其他條件並無太大的差別。

現代化對鄉村的影響，中國不如日俄。中國的城鄉有很大的距離，城市有明顯的現代化，鄉村則無之。日俄的政府與人民較為接近，注意鄉村，中國則不然。

教育改變了，白話代取文言，新式教育出身者在城市中頗有出路，但普及教育尚未開始。

總而言之，一九〇五是擺脫傳統的起始，但缺乏改革的衝力，不見近程的效果。整個落後日俄四十年。

一九三〇年：國民政府建立了雛型的工業。這一時期的特色為：一、中國得到了國際平等的待遇，但日本的壓力卻日漸加大；二、中央政府建立了，軍閥勢力日漸退卻；三、工業有快速的成長，但經濟力量仍然顯示不出來；四、城市中的組織多元化，商會、工會、家庭結構等均有改變；五、有相當數量工業人才的造就。以上五種情形在日俄現代化的初期也具備了，可見中國現代化的腳步很慢。

國際關係雖有進步，但並不是有利的。日本的侵略使中國又倒退了下來。物質方面的損失很大，人員的死傷無算，失落，退步，中國新領導階層的培植遭受極大的挫折。

此一時期的仇外心理較前加強，對國家的整合甚有幫助。但一九三〇年代尚無全面轉型的趨向。政治方面，政府在政黨的支持下似較強化，交通較前發達，但官

僚體系並未完全恢復。軍閥餘緒仍然存在，協調與控制仍嫌不足。

經濟方面，新式部門只佔生產總值三%，資本形成很慢。農業沒有持續的成長。個人所得仍屬現代前期的型態。由於抗日戰爭的關係，一九四〇年代縮減到最低點。比較早期的日俄，中國政府的積極性仍嫌不足，其成就只能比較日本的一八八〇年代，俄國的一八九〇年代。

一九五五年：中國已從長久的戰爭中恢復過來。此時中共正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，走向集體化，以社會主義為理想，要求現代化。

中共面臨的困難減少了。第一，國家主義的情緒十分強烈，在俄人的幫助下，若干實業機構建立起來了；第二，中共的控制加強了；第三，重工業快速的成長；第四，動員的成效明顯，鄉村與城市有了整合；第五，教育與新知識快速推進。比較言之，此時的情況與十九世紀末的日俄相同。

中共建立了以蘇俄為模型的政治，黨員深入地方，動員資源，打破了傳統的家族主義及地方觀念。一九五〇年代的經濟有成長，吸取了蘇俄的經驗，但資本甚感不足。接着便是激進主義的錯誤——大躍進，經濟受到了挫折，專家受到懷疑，不受重視，危機在潛伏中。

一九八〇年：中共一九八〇年代的現代化程式是什麼？目前尚無法確定。回顧一九五〇年代以來，有進步也有退步，是不平衡的。此有五大原因：一、一度排斥外來的援助，至一九七〇年才有所轉變而再度輸入技術與資本；二、監視與控制，顯示社會不安；三、每二三年發生一次激進運動，破壞經濟發展；四、反對私人利益，人民的創造意志消失；五、反專家反高等教育，使人才不得其用，管理退步。

今天的情形，落後日俄二十五年。今天的困難在如何支付所購入的工廠，僅有的輸出品為石油及紡織品，但為數不多。一九八〇年代仍將受到毛澤東陰影的影響，是否還會發生極端控制，產生全面性的癱瘓，不敢保證。

經濟生產是否能夠擴大？過去依靠勞力的不斷增加，今已無法繼續此一路線；要求增加生產，必須刺激生產意願。

中共控制下的中國，非農業人口太少：二〇%。日本在一九五五年時已高達五六%，俄在一九五九年時四八%。現代化在都市，不在鄉村，如此下去，難望快速發展。

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的政策對教育傷害極大，影響現代化的發展。目前各種人才均感缺乏。

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：現代化必須中央有權力，地方有資源，相對的互相支援。中央動員地方，地方給予配合，有整合的作用。可期望快速的發展。

清代早期的領導是有效的。皇帝具有控制力，內廷的權力也很大，中央官僚體系全盤控制。唯一的缺點是北京相去南方魚米之鄉太遠，有時發生鞭長莫及之感。

清廷講求人員的控制，於資源則置之不顧。十八世紀的控制嚴格，十九世紀則漸鬆弛，因此地方主義產生，地方亂事也就多了起來。

爲什麼中央不能繼續控制地方，爲什麼小城的人口那麼少，資源不能流向中央，地方官無有作爲，政府的責任轉而落到了家族的身上，紳士分散四鄉，城市發展極其有限？這一連串的問題並不容易回答。所能了解的是家族核心的基礎十分堅固，九〇%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鄉村，家庭與政府之間缺少一個連接體的組織，因此十分不易動員。

中央與地方最好有均衡的關係，家族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得到適當的調適。但實際上，人口快速的增加，家族利益自然高於國家利益，分權與分離的趨勢不可避免，政府因此衰微了，雖是二十世紀亦無法挽回。

歷史上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是整合的，紳士多在鄉村，學校到處可見。及至中央衰微，城市與鄉村的距離就愈來愈遠了。

廿世紀初葉，城市與鄉村的距離愈來愈大，紳士階級消失之後，中央與地方更失去了聯繫。北洋時期城市走向現代化，而鄉村無人問津。政府依靠城市的工業資源支持。鄉村閉鎖，人們感到只有家庭而沒有政府。中央沒有力量，地方主義大盛。因爲沒有中間組織，秘密會社盛行起來。家族的勢力繼續發展，加上地主階級，情勢更爲複雜。中央有心重建統治權力，然困難重重，現代化當然格外不容易。

國民政府努力重建中央權力不果，中共針對家族制度加以改造，消滅秘密會社，地方主義自此消失。

中共爲了人口問題，限制生育，不許擠向城市，移民開墾，改進鄉村醫藥衛生，但種種政策的推行並非十分有效。可謂困難重重。

全球性透視：中共控制下的中國，其發展程度如何，以資料不足，不容易得到回答。中國大陸有飛彈，但個人所得甚低。

科學方面，國民政府於一九二八年建立中央研究院，中共建科學院。一九七八年肯定科學研究的重要性，今有二十七種科技研究。以一%的 GNP 投入科學研

究。（俄爲三%，其他國家爲二~三%）高等教育方面，文化大革命是一大錯誤，也是一大損失。今日有千分之一的人受過高深教育。（美國爲百分之五十，日俄爲百分之二十，印度爲百分之五）過去在一九四六年時爲百分之〇·三，一九四九時爲百分之〇·二，一九六五時爲千分之一，一九七二年時爲百分之〇·二，一九八〇年恢復到千分之一。

政治方面，以事功爲衡量標準的官僚制度已不復存在。今日之工農重組，交通建設，教育發展，衛生服務，顯示行政能力之稍爲恢復。但對地方事務並不能完全控制，中央管不到公社中的事務。能控制的是城市，重工業區，安全亦尚能掌握。由於互爭領導權力，鬭爭激烈，文化革命之反官僚運動，損失甚大，今之官僚系統並不健全。

參與（political participation）更難衡量。所謂參與，是決策者徵求利益團體的意見。但中共的黨是唯一的利益團體，五分之四的鄉村人民並不扮演任何參與角色。用西方觀念來看，二十九省，大城市，工業區，科學技術團體等都可以稱爲利益團體，但他們不能自動表示意見，也沒有人請他們表示意見。在中共制度下只有生產大隊，街坊委員會、運動組織等稱得上是利益團體，但並無表示意見的途徑。

人口增加率：中國大陸的人口增加率爲百分之十六，中共預計在公元二千年時達到零成長。

都市人口：都市人口僅有二〇%，與非洲情況相同。世界各地很少見如此低城市人口的國家。南美爲六〇%，高度現代化的國家已達七五~八五%。中共治下的情況極爲特殊，甚難以世界標準衡量。

中國現代化的特徵：一、現代化知識問題，十九世紀爭論不休。土爾其也曾經有相似的爭論，但中國的爭論長達半個世紀之久。所幸中國的理性主義發展較快。二、清廷太弱，沒有領導能力，無法動員資源。此種不能振作的現象竟長達五十年之久。三、人口太多。一七五〇年時只有二億人口，一八五〇年增爲四億，爲世界人口三分之一，一九四九年五億四千萬，一九八〇年十億。

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：中國的文化於世界人文與科學的貢獻極大，但十九世紀領導階層衰弱，對世界的變動沒有興趣，二十世紀上半未能建立一強有力的政府，因此科學與技術均無預期的成長。

中國傳統時期的識字率與日本相同，城市化則與俄國相同，但發展較日俄落後四十年。

中國的傳統相當自我中心，舊時亦無鄰國敢於挑畔，因此十九世紀對西方的反應錯誤，直至二十世紀中葉才被逼轉變。國民黨、共產黨與印度一樣，都怪帝國主義，然何以日俄不同。這應該是反應的差異。

中共今天的情況，種種現代化的條件，利與不利，兼而有之。官僚制度是傳統的，動員是社會主義的，人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，經濟在成長，人口成長漸趨緩和。但目前的情況，經濟水平甚低，城市人口太少，高等教育不發達，仍然屬於落後國家的類型。

中共可以動員人民與資源，但今日的工作意願低落，這不是平均分配可以解決的問題。此外，參與制度尚未發展，個人自由仍多限制，生活有待改善，中共面臨的難題仍然很多。

以上大致是本書的內容和論點。讀盡全書，可以得到一個印象，這是一本綜合性的著作，而非原始性的研究。這當然是由於各章節所包含的範圍極為廣泛，勢非綜合性的討論不能得其全貌。我們非常感激著者們的通力合作的成果，使三十餘年來美國的中國研究和盤呈現在讀者的面前。加上他們有一個整合的架構，全書貫穿一致，讀來甚為引人入勝。可惜他們只有選擇性的註腳，若干出處被省略了，使人懷疑某些論點是否確有所本，這是美中不足。（當然全書多達五百餘頁，份量已經不輕，詳加附註，勢必要增加不少篇幅，更會有臃腫之感。）

本書最大的長處是比較方法的運用。中國現代化的落後與缺失，一經比較，一目瞭然。尤其比較日俄，更可得見中國落後的程度。

又本書論中國文化為早熟類型，亦有相當見地。早熟文化之所以不能及時現代化，不在文化的本身，而在領導者的無能。此一論點，有相當說服力。

雖然本書有許多令人欣賞之處，亦有若干觀點值得商榷。茲略舉如下：

帝國主義的問題：本書最先討論的是國際關係。著者認為帝國主義者只有日本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阻力，西方列強實際於中國沒有妨礙。讀者勢難同意此一說法。日本是中國的大敵，它劫奪中國的土地與物資，殺戮中國的人民，中國人受盡日本的壓迫，任何人不能忘記一八九四至一九四五這半個世紀的悲痛歷史。但是日本之敢於欺壓中國，實是有所倣尤。如果沒有西方人之侵凌中國於先，日本雖然也會步上帝國主義的道路，時間上或許會延後數十年；中國有數十年的喘息機會，或許在現代化上會有不同的成就。因此，我們不能不說日本帝國主義是學習西方帝國

主義而來的。西方帝國主義直接加給中國的壓力，從鴉片戰爭，英法聯軍，中法之戰，以至於八國聯軍，中國所蒙受的損失無法估計。僅僅八國聯軍一役的賠款，中國人平均每人必須以一個月的收入才能償付（估計當時的個人 GNP 為十二兩銀子）。要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能以一月的收入投入生產事業，其必然有一定的發展，何況中國的海關更是長期控制在西洋人的手中。西方學者曾經多次討論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。有人說，中國人在戰爭中損失不訾，有人說經濟受到最大的傷害，有人說中國人的挫折感最為嚴重，實際上三者都重重的壓在中國人身上。因此，對這一個問題的看法，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傷害只是比較性的，要說西方帝國主義不負責任，恐怕無法推得乾淨。

清季的地方主義：本書的基本觀點，認為清廷在咸同以後趨向衰弱，因此未能領導中國的現代化運動。這是一個公認的論點。著者根據此一基本觀點，進一步討論到地方主義（regionalism）的問題，Franz Michael 的理論在本書中得到肯定。惟清末是否盛行地方主義，近年來在美國的學界一直是個爭論的題目。我個人也不接受這一個說法。從自強運動至預備立憲，滿清政府大體上仍然控制着全局，各省督撫擁護中央，服從命令，絕無尾大不掉的跡象。本書強調李鴻章、劉坤一、張之洞為典型的地方主義者。此一論點似乎應當進一步斟酌。這三位代表人物實際上情況完全不同。李鴻章兼具中央與地方影響力，劉坤一庸庸碌碌，張之洞則可以稱為現代化的推動者（modernizer）。他們之所以在地方從事建設，不過是盡個人的能力，推動一些局部性的現代化，說他們有個人的野心，則尚待明確的證實。著者論李、劉、張三人為地方主義者，卻自相矛盾的說，他們都一直以慈禧太后為靠山，尋求她的庇護（頁八十～八十一，一〇四～一〇六）。如果真是這樣，更能證明他們不搞地方主義，因為尋求慈禧的庇護，便必須服從中央的命令。

自強運動的評價：同光之際的自強運動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個現代化運動，李鴻章是這一個運動的中心人物。本書對李氏的批評甚為嚴苛，茲引一段原文如下：

「李鴻章所致力之現代化措施只是為了達成個人的目的。軍事現代化並非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。李氏的主要考慮是使其控制下地區之軍事力量強於他處，別人不能匹敵，中央亦無奈其何，還得說他是一個忠於朝廷的大臣。他當然無意背叛中央，但是他沒有見及國家的利益。舉例言之，他沒有使軍事的現代化足以抗衡列強。這在日本正與李氏的情況相反。李氏的政策反復無常，毛病百出而腳步緩慢，因為他從不思考國家有賴於其現代化的支持。

……」(頁七十二)

這一類的批評實在沒有顧慮到當時的整個環境及李氏個人的心態。中國有一個輕賦輕稅的傳統，一向政府的財力甚為有限。李鴻章推展軍事現代化的建設，得到政府支持的財力極其有限，在有限的財力情況下，要求李氏有更大的作為當然不可能。傳統的士大夫往往以「明哲保身」為處世的原則，李鴻章不可能隨心所欲地推動軍事現代化。他與曾國藩一樣，顧慮樹大招風，任何作為適可而止。曾國藩平定洪揚之亂以後即萌退志。李鴻章以曾國藩為模範，不可能將自強運動的範圍擴展得太大。李鴻章的現代化知識有多少亦是一個問題。他不可能認識軍事的革新能夠帶動全面性的變遷。科學與技術在今天當然相結不分。但一八七〇年之前，雖是西方社會，科學與技術仍然兩不相涉。李鴻章絕不可能從軍事技術的革新體會到科學教育的重要性。但李鴻章因為軍事革新而有地下資源之開發，鐵路之修建，派遣留學生培植人才，實已難能可貴。翻閱李鴻章個人的文書，便會發現他的思想細密，應付環境小心翼翼。他同時也屬於有膽識一型的人物，果決地推動自強運動，並不畏葸。自強運動之受到限制，並非李氏一人所造成，也非李氏一人所能完全突破。自強運動雖然失敗了，但在中國整個現代化的運動中，仍然不能抹煞其萌芽作用。

中央與地方及城市與鄉村的連接：本書最吸引人的一個論點，是中央與地方不連接，城市與鄉村不往還。這是從動員論發展出來的觀點。要有現代化的發展，必定要中央能動員地方的物資，這樣中央才能有力量從事建設性的活動。換而言之，鄉村的物質必須流向城市，這樣城市才能形成強大的經濟力量，才能有現代化的動向。這些論點，是政治學及經濟學上不易的學理。著者們一致認為清朝末年的中央政府太弱，不能動員地方力量。又說中央與地方之間缺少了一個連接體，直到中共政權建立，其幹部制度才彌補了這一個缺點。另一方面，著者們認為中國的傳統城市是孤立的，鄉村的資源在鄉村流動和消耗，絕少流向城市。這種現象要到中共政權建立後，以生產大隊組織鄉村，才消除了鄉村與城市的隔絕。

這一個觀察甚能引人興趣，問題是如何求證。本書沒有根據事實的舉例。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或許都會同意紳士階級的連接體作用。中國科舉考試制度下產生的紳士階級，其為地方上的非正式領導階層是毫無疑問的。他們傳達政府的命令，為人民向政府請命，組織地方團練，結合民力修橋補路。此類功能不是連接體的作用嗎？要說中央與地方缺少一個連接體，那是科舉制度廢止以後的事。

鄉村的物資沒有大量流向城市應該是事實。原因不是兩者不求溝通，而是人口

太多，鄉村所生產的糧食只够鄉村消耗，沒有太多的節餘可作商品之用。

誰住在城市中：由鄉村與城市的連接，我們連想到誰住在城市的問題。著者說中國傳統時代的城市，人口在三千至一萬者，大約有一千個。都市人口約為六%。中國的人口分配，農民佔九〇%，商人四%，士三%，工二·五%。（頁一五一）著者同時又說，中國的城市不吸引人，窮人在城市的所得不如在鄉村高。紳士很少住在城市，他們散居鄉間。中國的佃耕並不嚴重，也很少有不在場地主（*absentee landlord*）。商人與手藝人也在鄉間。如此說來，究竟誰住在城市中，六%的城市人口如何得來？著者指出，城市是行政中心，（不是商業中心）官員才住在城市，但政府的官員很少，每一個縣政府，連縣長的下屬不過五六人，以每家五口計，全部不超過五十人，那麼一千人的都市，誰為成員？

照我們的了解，城市是工商業者活動的場所，是富有者的樂園，紳士、不在場地主都居住在城市中，著者的看法正巧完全是相反的。這一個問題同樣需要實證研究。

地方能否發動現代化：著者的看法，物資必須集中中央，如此中央方能發動現代化。中國由於資源散在地方，所以中央沒有發動現代化的力量。但我們必須要問，是否只有中央才能發動現代化？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固然多由中央發動，但日本德國則從地方開始，日本的現代化始於長洲和薩摩，德國始於普魯士。不知著者是否想過這個問題？清朝末年的湖南新政運動（一八九五～一八九八）轟轟烈烈，可以視為地方發動的現代化。可惜未能得到全面性的響應，便被保守主義者破壞了。

中國文化與現代化：因此，中國的現代化與清廷中央的衰弱有關固為原因之一，但未必就是唯一的原因。西方學者的論著，不少論及中國文化的動力問題，他們的焦點在儒家思想。早期如 Max Weber 便認定儒家思想是不利於現代化的^⑤。耶魯大學 Arthur and Mary Wright 夫婦的論著益發如此肯定^⑥。但最近的觀點似乎改變了。中國華僑在海外的成就，中華民國在臺灣之卓然有成，證明儒家文化並不敵視現代化，所以哈佛大學 Dwight Perkins、加州大學 Thomas Metzger 等人一反過去的觀點，改而肯定儒家文化的現代性。本書對儒家文化避而不談是一件遺憾的事。既然是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，應該表示著者的意見。我們相信儒家思想與

⑤ Max Weber, *The Religion of China*. (New York, Free Press, 1968)

⑥ Arthur Wright & Denis Twitchett (eds), *Confucian Personalities* (Stanford, 1962), see introduction; Mary Wright, *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*. (New York, 1957)

現代化必有正反兩面的關係。現代化的研究者不可無言以對。

至低限度教育與知識一章應該提到這一個問題，然而這一章的主題是強調中國的傳統不太重視科學，所以才沒有技術革新的突破。根據 Thomas Kuhn 的看法，西方的科學與技術直到一八七〇年代才漸漸互相接合，西方的技術革新早期並不依賴科學的昌明^⑦。那麼檢討中國十九世紀以前有無科學教育並無太大的意義。主要的，仍當追問儒家文化對於技術革新的態度。

中共的經濟成長：我在這篇書評中只介紹著者們對中共三十年來的現代化論點，不擬加以批評，因為我的任何批評都會引起爭論，說我不够客觀。不過我十分懷疑本書確定中共三十年來工業平均成長一〇%的說法 (p. 509)。這個數字大約得自 Alexander Eckstein 所編 *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China's Economic Output, 1980*，中共經濟生產的量化統計) 一書。該書謂中共的經濟成長，一九五二~一九五七時期為八·五%；一九五七~一九六五為四·六%，一九六五~一九七四為六·八%。這三個數字費景漢 (John Fei) 認為是中共謊報的，不可相信^⑧。今日大陸的人民所得，不過美金三百餘元，要是有平均十%的工業成長率，人民生活不會如此低落。中共對統計資料往往守口如瓶，或誇大其詞，因此，使用他們的數字，應該十分小心。

以上是個人的淺見，提出來和著者們討論。我相信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仍有繼續討論的必要。駱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，是討論中國現代化的里程碑，它雖然有許多難於滿足其讀者的地方，其綜合性的討論卻難能可貴，讀盡全書會得到不少新的啟示，這不能不感謝著者們苦心經營的成果。

⑦ Thomas Kuhn, "The Rel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History of Sciences," *Daedalus*(Spring, 1971), 程樹德譯「歷史與科學的關係」，載康樂、黃進興編，*歷史學與社會科學* (臺北, 1981)。

⑧ 見費氏書評，載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, Vol. 41, No. 1, Nov. 1981, p. 107-109.